

中国古代共同富裕的理想、 财政实践与当代启示

史 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中华文明核心的主流价值,萌生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至今。共同富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结合点。财政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古代士人在共同富裕的理想里建构了中华文明的财政生成理论,希望通过“为民制产”建构起点均等,努力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为人民创富提供公平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构共同富裕的兜底体系,并试图通过“以礼制富”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中国古代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创造性地予以借鉴,更好理解共同富裕的历史底蕴、科学内涵,丰富新时代促进共同富裕的思路: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为民制产”方案,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石;坚持“富民为始”的原则,将共同富裕建构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上;发扬“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带领弱势群体携手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关键词:中国古代 共同富裕 财政实践 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F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3)02-0004-05

一、共同富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

(一)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一个基本理想

每个文明都有其内在的普遍性的主流价值,影响着文明的基本走向。共同富裕就是中华文明核心的主流价值,萌生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至今。

共同富裕的理想直接来自中国先民对原始共产主义的美好回忆,《礼记·礼运》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称之“大同”。^①这种大同理想也成为国家治理的目标。《礼记·大传》指出,君主治理天下,必须做到“民无不足、无不赡者”。^②《礼记·杂记》更将“地有余而

[收稿日期]2023-01-06

[作者简介]史卫,教科文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财政史、财政政策。

①《礼记·礼运》,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19-420页。

②《礼记·大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656页。

民不足”“众寡均而倍焉”称为君子之耻。^①《周礼》提出国家的职责是“以均万民”“以富邦国”“以生万民”。^②

先秦诸子虽然立场有异,但是都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理想。孔子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③他提出施政应将富民放在首位^④，“因民之利而利之”^⑤，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⑥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⑦，提出为民制产,通过授予人民一定量的耕地,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通过生产实现衣食无忧。^⑧对于鳏寡独孤等能力不足的,国家应该建立社会救助制度。^⑨墨子提倡“兼爱”“交相利”,其治理理想是“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⑩他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提出政府应该通过税收充实府库来“养万民”,所谓“官府实则万民富”。^⑪老子向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⑫,

提出治理天下,应该“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⑬庄子把上古“天下无穷人”^⑭的社会作为理想,提出“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要让人民“财用有余”“饮食取足”,实现“天下均治”。^⑮商鞅变法虽从强国视角立论,但着力推行小家庭制,建构起编户齐民体制,把授田面积从每户 100 步扩大到 240 步,鼓励人民戮力生产,通过税收等手段制约工商业者过多获利。^⑯荀子综合各家,提出“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⑰的主张。

中国这种以共同富裕为核心追求的民族文化基因,是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从原始社会向国家阶段发展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第一个分水岭。中国地处东亚大陆,是一个非常大的整体的独立空间,特别是文明最早突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平原地带,而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的“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⑱人民必须相互协力才能改造自然环境,得以生存下去。4300 年前,地球进入小冰期,出现了全球性大洪水,其他民族多采取了逃难避灾的办法,而中华民族却无处可逃,只能协力抗灾。世界流传下 30 多个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只有中国的大禹是“治水”。孟子说,各部族必须团结起来以“以四海为壑”,如果各部族都只顾自己部族利益,“以邻国为壑”就会造成更大的危害。^⑲中华文明就是这样在“调有余相给”^⑳,互助共生中不断融合,带着原始的共同富裕的理想走入了文明时代,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了超大规模的文明体。虽然期间经历了多次惊涛骇浪,但总能不断融合统一实现复兴,生生不息延续至今。

①《礼记·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826页。

②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③《论语·季氏》,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5页。

④《论语·子路》,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3页。

⑤《论语·尧曰》,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6页。

⑥《论语·雍也》,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2页。

⑦《孟子·滕文公上》,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页。

⑧《孟子·梁惠王上》,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页。

⑨《孟子·梁惠王下》,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7页。

⑩《墨子·天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5页。

⑪《墨子·尚贤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7页。

⑫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45页。

⑬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336页。

⑭《庄子·秋水》,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96页。

⑮《庄子·天地》,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41-444页。

⑯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10-2712页。

⑰《荀子·富国》,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50页。

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2页。

⑲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8页。

⑳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6页。

（二）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提升到新的境界

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成为中国古代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理想追求，他们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近代以来，国家饱受欺凌，人民苦难深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研考民生凋敝之原”^①，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们学习、探索、辨析各种主义，最终选择和验证出马克思主义是最适合当时中国需要的思想理论。共同富裕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的结合点。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有某些同构的关系。特别是和儒学那种注重实践、那种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强烈的社会意识、历史感受有不少可以找到结合点的地方”。^②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的民生为价值目的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指出，“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宣布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及贫苦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④提出

一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充分利用新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渐次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财政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一）共同富裕的理想构建了中华文明的财政生成理论

中国先秦各家正是在共同富裕的共同理想基础之上构建了财政生成理论。儒家认为人生而不平等，有着能力的差异，“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势不可也。”所以需要国家和财政，“济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使得于天厚者不自专其用，薄者有所仰以容身”。^⑤墨子认为国家的起源是因为人类生存的需要，需要国家来解决人民生活的困苦，这也就需要国家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⑥法家则认为人都是自利的，所以要建立公平的财政制度，鼓励人民勤劳致富，“农则易勤，勤则富”^⑦，“论其税赋以均贫富，……使民以力得富”。^⑧与此同时，“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⑨，救济灾荒，防止民众因遇灾而扩大贫富差距。

（二）为民制产建构起点均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土地是农业经济时代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人民生活经济生活皆仰赖土地。所以古代先贤认为公平均等分配土地，做到“财均力平”“均民力”^⑩，创造人民勤劳致富的起点均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从公元前 2070 年到公元 1911 年，中国从进入国家阶段到帝制时代结束的 3981 年里，在全国大范围内实行授田制度的有 2143 年，占到一半以上。这还不包括一些局部地区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各有分地”^⑪“计口授田”^⑫“计口授地”^⑬“计丁授田”^⑭。可以说在整个

①郁崑：《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龟年”为李大钊曾用名，《言治》1913年第4期。

②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306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4页。

⑤方孝孺：《逊志斋集》，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

⑥《墨子·天志中》，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5页。

⑦《商君书·壹言》，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1页。

⑧《韩非子·六反》，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63页。

⑨《韩非子·显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38页。

⑩何休解诂，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79页。

⑪司马迁：《史记·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96页。

⑫魏收：《魏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50页。

⑬脱脱：《金史·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

⑭《清史稿·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3518页。

人类文明历史中,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授田的同时,政府还积极介入经济建设,不仅组织大型水利建设,还普及农业科技,帮助农民精耕细作增加收入。但是土地私有制确立后,土地兼并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牵动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以致“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①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土地兼并带来财富分配不均引发贫富分化加剧的危害,“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②为了抑制土地兼并的危害,古代先贤先后提出了限田制、王田制、占田制、均田制、正经界、配丁田法、均分草荡法等各种方案,有些方案还进行了试点。

(三) 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为人民创富提供公平环境

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建立起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就是把全体人民编入国家户籍,不分贵贱,身份平等。全体人民都是国家的纳税人,有着同等的纳税义务。商鞅变法就建立了“赋税平”的原则,使“耕织致粟帛多者”得以多劳多得。^③在古代大多数时候,基本能实施较低税率。如汉代三十税一,唐代四十税一。^④力役也兼顾农时,并逐步货币化。孔子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⑤税制设计上,兼顾土地肥瘠、地理远近等因素,力求负担均等。对于边缘贫困地区,还多采取羁縻怀柔的政策。但是统

治阶级总会想方设法将赋税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致使古代在很长时间出现了赋税以人丁为本的现象,虽然唐中期就提出“以资产为宗”^⑥的改革方向,但直到清初才实现了将人头税、徭役负担全部摊入田地,使纳税数量和负担能力相符合。中国历史显示,一旦政府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使人民无以为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⑦,离王朝灭亡的时间也就不远了。但只要新王朝能恢复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为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人们就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⑧,带来一段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的盛世景观。

(四) 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构共同富裕的兜底体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公共福利体系的国家,大禹就提出了“政在养民”。^⑨西周有七德六保,齐国有“九惠之教”。汉代时就有了收养孤儿、赈恤鳏寡、尊老养老、医药救助、放赈救灾、助贷贫民等社会救助措施。六朝时期,已经建立起专门的救助机构,如孤独园、六疾馆等。此后,各种救助机构更加广泛地建立起来,如福田院、广惠仓、安济坊、漏泽园、居养院、留养局等,涵盖了各种弱势群体。汉代王莽尝试建廉租房,宋代设“店宅务”管理相关事务,到清代还有为贫困八旗子弟提供官房的制度。历代政府除了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外,也多通过赐爵、表彰、减税等办法引导民间力量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著名的棠樾村的“乐善好施坊”,就是为褒奖歙县鲍漱芳父子常年捐款赈灾热心公益,由嘉庆皇帝赐建的。宗族组织也会建立对族内弱势群体的救助机制,其中以范氏义庄最具特色。从历史上看,一般朝

①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81页。

②苏辙:《田制》,见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35页。

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10-2712页。

④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海口:海南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⑤《孔子家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6页。

⑥陆贽:《陆贽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22页。

⑦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1页。

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3950页。

⑨《尚书·大禹谟》,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5页。

专题策划：财政与共同富裕

代早期,政府较为清明,执行比较有力,是造就盛世的重要支撑点,但到了朝代中后期,官员腐化加剧,国力也整体衰弱,许多制度形同虚设,救助水平大为降低。

(五)以礼制富将贫富差距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最鲜明的特征,礼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而礼中也包含了古人对共同富裕的理想。荀子在《礼论》中指出先王制礼是为了“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也就是要调节社会贫富分化,做到“损有余,益不足”。^①礼对每一等级的用度标准进行了规定,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对统治阶级的奢靡浪费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即“节用以礼”。^②但是,由于礼有着等级性,所谓“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③,实际上也为贫富分化提供了合理化解释,无法真正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三、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创造性地予以借鉴,更好理解共同富裕的历史底蕴、科学内涵,丰富我们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路。

(一)探索新时代“为民制产”方案,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石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调节收入分配,更要完善财富分配机制。中国很早就认识到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会扩大人民财富的差距,提出富民的第一步就

是要使民有恒产。在农业经济时代,财产性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有土此有财”。^④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更加丰富,更要着力探索拓宽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让全体人民共有共建共享发展成果,最大限度补偿和克服“马太效应”对共同富裕的侵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⑤近年来,在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共有产权房等探索,在乡村振兴中出现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探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二)坚持“富民为始”的原则,将共同富裕建构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历史经验也告诫我们要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必须把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建构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之上。“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应努力打造一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的更加普惠公平的发展环境,为“民自富”创造条件。要努力解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让所有人民都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创造财富的公平权利。特别是要提升劳动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鼓励人民靠勤劳和智慧致富,以蓬勃向上的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渐进推进共同富裕。

(三)发扬“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带领弱势群体携手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振乏救穷”“补民之不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措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大力发

(下转第 58 页)

^①《荀子·礼论》,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51-779页。

^②《荀子·富国》,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24页。

^③《荀子·礼论》,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51页。

^④《礼记·大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172页。

^⑤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